

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

周世宗显德六年（959 年）六月十四日，赵匡胤就任殿前都点检，十九日，世宗卒。第二年正月四日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建立了长达 300 多年的宋王朝。事实看起来很简单，却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一、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的

这里旨在探索下述问题：

1. 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时，具备哪些足以夺取政权的条件，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在世宗新丧之际夺权，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动手？

2. 殿前司的衙门就在宫城左掖门旁，为何赵匡胤不直接发动宫廷政变，却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？

3. 长期担任殿前司最高统帅之职的张永德，为什么不能东山再起，直至夺取政权？

4. 侍卫亲军司的统帅李重进，拥有比赵匡胤更大的兵权，为何不去夺取政权，或有效地阻止赵的夺权？

要回答这些问题，必须客观地分析一下周世宗去世前、去世时和去世后的形势。

周世宗在位时期（显德元年正月至六年六月）

后周军制和后汉相比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即新设殿前司，与侍卫亲军司分掌全国兵权。郭威是在侍卫亲军司的高、中级将领支持下夺取政权的，为了防止有人蹈袭他的故伎，于广顺二年（952年）创建了殿前司，任命外甥李重进担任殿前都指挥使，其地位低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下辖铁骑左右两厢骑兵，控鹤左右两厢步兵。每厢各二军，共2万人。人数不多，战斗力颇强，是一支中央禁卫部队，地位至为重要。

侍卫亲军司最高统帅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次为副都指挥使、都虞候。下设龙捷马军都指挥使，统率骑兵，虎捷步军都指挥使，统率步兵。马步军均分左右两厢，各设都指挥使，厢下设军。厢的编制远比殿前司大，王彦升于广顺元年未任龙捷左第九军都虞候，可见龙捷一厢至少有九个军。张铎在后汉末任奉国（后周改称虎捷）右第六军都指挥使，^②韩通于汉末任奉国左第六军都校，可见虎捷一厢至少有六个军，每军2500人，虎捷十二军3万人，龙捷十八军45000人，侍卫亲军司总兵力至少为75000人。如按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1《军制》和卷2《旧阅法》所载宋制“十军为厢”计算，则侍卫亲军司的总兵力为10万人。郭威为帝时，王殷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他赴大名就任天雄军节度使，“以侍卫司局从，凡河北征镇有戍兵处，咸禀殷节制”；有震主之势。^④广顺三年（953年）冬，郭威患病，害怕王殷接管政权，设计将他处死，改任李重进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，统率侍卫司，又任命驸马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，统率殿前司。

两司实力不同，官员级别也有高低，殿前司的都指挥使略低于侍卫司的马步军都虞候，这由李重进从前者晋升为后者可以

推知，殿前司的副手都虞候则低于侍卫司的厢都指挥使，这由殿前都虞候韩令坤因功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可以推知。聂崇岐将殿前都虞候与侍卫都虞候并称为高级将领，^⑥显然是不正确的。

周世宗显德元年(954年)三月，后周与北汉在高平决战，殿前司兵马居中，侍卫亲军司兵马分居左、右两翼，其右翼军一触即溃，幸亏殿前司军奋战，才反败为胜。战后，世宗处死逃将70余人，改派殿前司的一些将领充实到侍卫司。十月，世宗对军队作了一番整顿，他命令殿前都虞候赵匡胤负责挑“选武艺超绝者，署为殿前诸班，因是有散员、散指挥使、内殿直、散都头、铁骑、控鹤之号”^⑦。此时，精选的皇帝近卫班直也归殿前司管辖，其数量可能与宋初相当，约数千人，和殿前司军合计，将近3万人。世宗又命李重进将侍卫司中“老弱羸小者去之”，世宗曾说“侍卫兵士累朝以来，老少相半，强懦不分”，^⑧则所淘汰的兵士数目不少，侍卫司的人数可能下降到6万人左右，与殿前司兵力之比缩小到二比一，但战斗力则比原来有所提高，《旧五代史》称“诸军士伍，无不精当”，当去事实不远。

殿前司的实力加强了，张永德的地位并没有提高，而李重进则在显德元年七月由都虞候升为都指挥使。更使张永德难堪的是，显德三年(956年)正月，当他随同世宗讨伐南唐时，李重进被任命为淮南道行营招讨使，成为这次战争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官。在恼怒、妒嫉、争权的心理驱使下，张永德经常向部下散布李重进的坏话，甚至派亲信密告世宗“重进有奸谋”。世宗很了解李的为人，没有理睬此事。李则考虑两人不和已严重影响军心，在当年八月，单骑往永德帐中，向张敬酒，表示诚意。世宗采取搞平衡的手法，于十二月十四日，特设殿前都点检一职，由张永德担任。这样，张的地位就和李相当了。张留下的空缺，则命赵匡

胤担任。平心而论，李、张的矛盾，曲在张。攻南唐的战功，李大于张，世宗的处理方法不是太公道的。从心理状态分析，世宗是多疑的，谣言造多了，他即使不信，也得有所防范。显德四年六月，他得知濠州刺史齐藏珍曾游说过李重进，便找个借口，将齐杀了。这一切自然会激起李对张的仇恨。显德六年（959年）五月，世宗北征契丹的返京途中，在供军之物中收到一木片，长二三尺，上面画了许多卦，卦旁均题“点检做”^⑩，一说木片是从四方送上的文书中发现的，上题“点检作天子”^⑪。这显然是李重进一伙搞的鬼。六月十五日，世宗在病情加重之际，下令免去张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，改任澶州节度使，并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。

周世宗去世之日

六月十九日，周世宗去世，此时的形势是：

1. 客观形势，主少国疑。世宗之后符氏六月九日才册封，年仅二十三岁，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力量。
2. 赵匡胤的个人条件，他在高平之战与淮南战场的功绩已充分证明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，殿前都点检一职，使他掌握了数万精兵。然而要搞政变，仅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，张永德也曾有过这些条件，周世宗一纸命令，便剥夺了他的实权。郭威政变成功的主要因素是高中级禁军将领的支持，尤其是把兄弟“十军主”的拥戴，^⑫从基层逐次上升的赵匡胤正有一帮把兄弟，号称“义社十兄弟”，其中最出名的有石守信、王审琦、李继勋三人，其次有韩重赟、杨光美（杨美）、刘廷让，《宋史》中均有传。他们都是汉乾祐时投入郭威帐下的，结为兄弟，当在此时，结拜时需刺臂出血宣誓：“凡我十人，龙蛇混合，异日富贵无相忘，苟渝此言，神降之罚。”郭威十兄弟结拜仪式即如此。^⑬经过几年的奋战，到

世宗卒时，石守信任殿前都指挥使，王审琦为右厢都校，李继勋为战耀左厢都部署，权知邢州（他在显德三年六月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，后因淮南战争失利，降职），韩重赉为控鹤军都指挥使，刘廷让为铁骑右厢都指挥使，杨美为铁骑都指挥使。此外，尚有赵匡胤“尝拜为兄”的赵彦徽，官虎捷右厢都指挥使。^⑬与赵匡胤之父有宗盟之份的赵晁，官河阳节度使。^⑭这些人已是高、中级将领，手中掌握实权，他们希望从政变中得到更大的好处。

赵匡胤自显德三年（956年）以来先后网罗了一批人才成为自己的智囊团。著名的有赵普（922~992年）是个颇有心计的小知识分子，显德六年为赵匡胤幕下的掌书记。^⑮吕余庆（927~976年）显德三年赵匡胤闻余庆有才，奏为从事。^⑯刘熙古（903~976年），博通经史，是赵匡胤幕府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人，任建德军节度判官。^⑰沈义伦（909~987年）精通三礼，善于理财，任观察推官。^⑱赵匡胤帐下还有一位都押衙李处耘（920~966年）史称其“善谈当世之务，居常以功名为己任”是一个有谋略、有胆识的武将。^⑲

3. 赵匡胤搞政变的阻力也很大。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侍卫亲军司，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，能征惯战，握有重兵。副都指挥使韩通，有勇寡谋，誓死效忠周室。潞州的节度使李筠居潞（今长治）八年，在镇“擅用征赋”养兵3万，几乎是雄镇一方的割据势力。^⑳步军都指挥使袁彦，也是与赵为敌的大将。^㉑

此外，尚有不少中间势力，如引进使曹彬等，^㉒宰相范质、王溥、枢密使魏仁浦与赵匡胤、李重进均无特殊关系。

总之，周世宗去世之时，赵匡胤虽有政变的实力，但反对势力甚强，而赵的准备不足。赵在登上最高军阶之前，有两大统帅在前挡道，尚无发动政变的想法，就任殿前都点检离世宗死才四天，即使有政变的心理，也仅在萌发阶段。

恭帝在位时期（显德六年六月二十日—七年正月四日）

恭帝即位后，赵匡胤开始作政变准备，第一个重大行动在七月十七日，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为陕州节度使，解除了他在侍卫司中的军职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，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令铎升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

第二个重大行动在七月十九日，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，让他去路途遥远的扬州当节度使，保留军职。

这两个行动将侍卫司中的两名主要实权派排挤出去，由于两人改任节度使，李尚保留军职，比张永德稍强，他们还能接受新命，而韩通等人职务未动，不会对这些行动有更多的猜疑。新升官的三人中，高、张是赵匡胤的密友，韩则属中间势力，与此同时，王审琦也由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升为殿前都虞候。^②

何以见得这些行动出自赵匡胤的旨意？首先，应当看到这不是周世宗的旨意，如是世宗旨意，一定会在六月十五日解除张永德军职时解决，或者在次日的人事更动中发布新命。也不可能是遗诏，遗诏不会拖一个来月，更不会分几次宣布。其次，这不是宰相范质等人的旨意，范等没有介入这两股军人势力，没有必要发布厚此薄彼的命令。当然也不会是七岁小皇帝的旨意。剩下只有赵匡胤这一种可能性了。赵本人无权发布这种命令，但他有一个特殊的条件，符太后与赵匡义（宋太宗）的妻子是亲姐妹，他完全可以通过太后的口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现在，再来具体考察一下二司实权派的状况。殿前司的前四位人物是：

殿前都点检赵匡胤、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、殿前都指挥使

石守信、殿前都虞候王审琦。

以上四人中，赵、王、石是盟兄弟，慕容延钊（913~963年）与赵关系不错，赵“常兄事延钊”^②，他不是赵的集团成员，对赵发动政变，未必赞同。赵匡胤在政变前将他打发到澶州任镇宁军节度使，军职不变。

殿前司厢级指挥官四人，知其姓名者二人：

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刘廷让、控鹤右厢都指挥使马全义均为赵匡胤的心腹。至此，殿前司可以说已成为赵匡胤发动政变的大本营了。

侍卫亲军司的前五号人物是：

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、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、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、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、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这五人中，李已打发到扬州，高、张是赵匡胤集团的要员。韩令坤（923~968年），与赵匡胤关系亲密，但不是赵集团中人。赵为了保险起见，于显德六年冬，让他去河北防守“北边”^③。这样，在京的侍卫司里效忠周室的只剩下韩通一人了。

厢一级的统帅有：龙捷右厢都指挥使祁廷训、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光翰、虎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

张、赵是赵匡胤集团中人，祁是“临事多规避”的胆小鬼^④，他不入伙，也不妨事。至此，侍卫司除了韩通以外，大体上也被赵的势力控制了。

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，赵匡胤不能越过韩通，直接指挥侍卫司的军队；而如果不直接掌握这支军队，韩通运用他的合法权力，组织反抗，政变就会出现流产的危险。

如何逾越这个障碍？赵匡胤和他的智囊们都会记得九年前发生的一件大事：

后汉隐帝乾祐三年(950年)十一月二十八日，“河北诸州驰报契丹深入”后汉命枢密使郭威率大军北征当军队到达澶州在开封之北270里处时郭威发动兵变打回京城，自立为帝。^④这个情报，不是完全虚构的，这年十月，契丹确曾南下，十一月攻占内丘县，随即屠城而去。郭

胤

960

胤

胤

张永德和赵匡胤相比，军功和地位差不多，但他作为郭威的女婿，几乎是一步登天掌握军事大权的，因此他没有像赵那样和低层军士或下级军官结成盟兄弟。他虽然一直是赵的上司，却没有赵的基础。相反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与李重进抗衡，还有意拉拢赵。显德五年，赵匡胤娶王氏时，张永德特意“出婚钱金帛数千以助之”。他也没有一帮谋士为之献策，因而解除军职以后，无力东山再起。

李重进的军功、地位均在赵匡胤之上，他作为郭威的外甥，也是平步青云，没有一帮把兄弟。他的年龄比柴荣大，且掌握实权。但当郭威临终前召他“受顾命，令拜世宗，以定君臣之分”，他全都照办，忠心耿耿地拥戴世宗，没有乘机夺权的念头。本来，他如不去扬州，是能够阻止赵匡胤政变的，但他没有远见，老老实实离开了首都。他缺乏像样的智囊团，偶而有人献策，也听不进去。他没有想到赵匡胤会发动政变，自然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粉碎政变。

二、赵匡胤是怎样巩固政权的

赵匡胤上台后，迎面而来的有三大问题：(1)巩固政权，(2)统一天下，(3)发展生产。三者互有关联，没有一，谈不上二、三，没有三，也难达到一、二。一包含两个内容，其一，巩固当前的政权，其任务是清除异己，站稳脚跟，着眼于近期；其二，长治久安，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，着眼于未来。在解决近期任务时，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同时解决社会生产问题。在追求未来目标时，则必须同时注意发展生产，并为统一天下创造条件。这两个目标是有矛盾的，要清除异己（包括统一天下），必须重用武将；要长治久安，必须重文抑武。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，赵匡胤及其谋

士们处理得相当周全、适时。

赵匡胤迈出的第一步是大封功臣，具体措施如下：

1. 正月十一日，加封有拥戴之功的将领。

石守信：归德军节度使、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。高怀德：义成军节度使、殿前副都点检。张令铎：镇安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。王审琦：泰宁军节度使、殿前都指挥使。张光翰：江宁军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。赵彦徽：武信军节度使、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。

这些人都是未来解职的对象，加封是为稳定军心，并借助他们平定异己势力，这就是兵法所说“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”的策略。

2. 正月十二日“赐文武近臣、禁军大校袞衣、犀玉带、鞍勒马有差”^②。

3. 拉拢领兵巡边的高级将领韩令坤、慕容延钊。正月十九日，以延钊为殿前都点检、韩令坤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成为二司的最高统帅。这一手相当厉害，两人接受命令吧，名誉上高了一些，但二司实权已全被赵匡胤亲信所掌握；不接受吧，势孤力单，易招杀身之祸。考虑再三，他们终于选择了“听命”的道路。

4. 正月二十二日，重赏高级参谋，以刘熙古、赵普为左、右谏议大夫，吕余庆为给事中，沈义伦为户部郎中。

应当指出，加封是有分寸的。

其一，对可能威胁王权的人，即使关系好，也不给实权。最典型的是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，正月的加封没有他的份，直到八月才给他下了一道命令，由忠武节度使改任武胜节度使，把他从离东京甚近的许州迁到较为偏远的邓州（今河南邓县），只是赏给他 20 万钱，作为当年张送赵彩礼的回报。按说张是提拔、重

用赵的恩人，从道义上说似应重用，但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，赵的将领都是张的下属，一旦有所动作，就会危及赵的皇位。出于政治的需要，赵就毫不犹豫地让他坐冷板凳，直到赵去世，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变化。《宋史》卷 255《张永德传》说“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”，张永德若是地下有知，恐怕是会苦笑。

其二，贬斥侵害文臣的武将。赵匡胤亲信将领王彦升刺杀韩通有功，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。四月的一天晚上，他突然闯进宰相王溥家里勒索钱财，王溥告发此事，赵匡胤立即将这位功臣贬为唐州团练使。

内部营垒稳定以后，赵匡胤又迈出第二步：铲除异己势力。

异己势力有两股，潞州的李筠，扬州的李重进。李筠在潞多年，根子较深，且向北汉称臣，离东京甚近，威胁大，需先解决。李重进军事才能比李筠高，但他刚去扬州，没有势力，那里是被他所征服的南唐臣民，不会跟他造反，可以靠后解决。总方针确定以后，4~6 月间，赵匡胤命石守信、高怀德平定了李筠，9~11 月间，又命石守信、王审琦镇压了李重进的反抗。

至此，巩固当前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。接着开始考虑巩固政权的第二个目标：如何长治久安，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。赵匡胤为此征求了高级参谋赵普的意见，赵普指出关键在于方镇事权太重，对付的办法是“稍夺其权，制其钱谷，收其精兵”。赵匡胤听罢，心中已经明白，让他不必说下去了。^④有人以为这三句话就是赵匡胤治国的总方针，这是一种误解。赵匡胤听赵普意见，不等于一切方针由赵普制订，总体方案的设计师是赵匡胤而不是赵普。从实施的情况考察，这三句话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，它没有包括如何解决禁军统帅问题，而且只谈了“破（削方镇权）没有谈“立（由谁掌权）”。赵匡胤此时的总方针应当说是以文官政治取代武将专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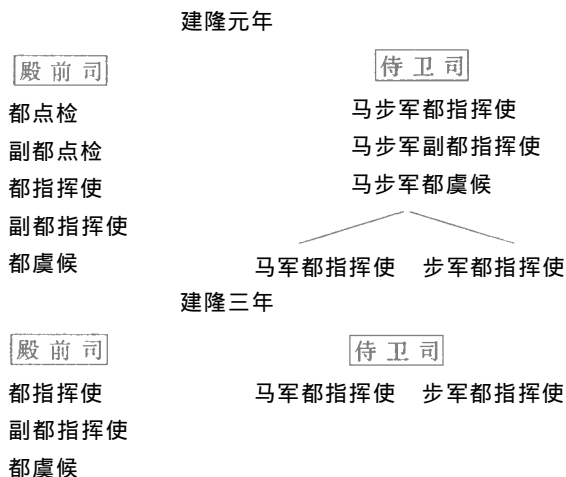
为此，赵匡胤首先解决禁军统帅问题，他从切身经验出发，认识到有威望的禁军统帅容易成为政变的领袖，因而决定不使宿将典禁军，先罢非亲信，后罢亲信。

建隆二年（961年）闰三月一日，解除非亲信的慕容延钊、韩令坤的二司最高统帅的军职，罢为节度使。

同年七月，任命亲信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王审琦、张令铎为节度使，免去高、王、张的兼职，石的军职暂予保留，但事实上与当年的李重进一样，不掌侍卫司的兵权，第二年连名义上的军职也免了。赵匡胤给他们以优厚待遇，或结为亲家，这就是历史上传为美谈并有所夸张的“杯酒释兵权”。

与此约略同时，任命义社十兄弟中资望浅者典兵，如韩重赟、李继勋，或较听话的将领如曹彬等人典兵。

这样做，仍不足以解除隐患，因为资望浅的时间一长也可以变为声望高的。赵匡胤看到，当年郭威对付二十来岁的皇帝，只用半个多月就夺了权，他对付七岁小皇帝，却费了半年，重要的原因在于汉末只有一个侍卫司，而周末二司分掌兵权，互相牵制，如果一分为三，那就更难改变了。于是不再任命二司的高级军职，使兵力较多的侍卫司事实上分解成马军、步军二司，到宋真宗时就直接称之为“三衙”了。为了清晰起见，列表对比如下：



其次，着手解决方镇问题，具体措施是：

1. 严禁节度使置私人武装。乾德四年（966年）盟兄弟韩重赞置亲兵，几乎被诛。

2. 罢武臣节镇。开宝三年（969年）罢武行德、郭从义、白重赞、杨廷璋节镇。以后陆续罢其他人节镇。

3. 将兵权、财权、司法权收归中央。

4. 用文官为节度使，如赵普。节度使逐渐为无实权的官名。

5. 取消节度使领支郡。以文臣知军州事，设通判以牵制。

6. “强干弱枝”，将精兵补入禁军。京师驻军与地方驻军数量相当，使之内外相制。^④

7. 长期保留前代所设的枢密院机构，以文臣为枢密使。枢密使有制令之权，而不直接掌握军权，三衙有掌兵权，而无制令权，使两者相互牵制。

中央政府则由宰相、枢密使、三司使分掌政、军、财大权，又

加强监察机构的权力，以防微杜渐，逐年扩大进士名额，使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由文臣掌管。

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，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宋王朝没有变成第六个短命王朝。只是赵匡胤本人却丧生在亲弟手中，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。

最后，简单解释一下赵匡胤对功臣宿将的态度，为何不像汉高祖那样去屠杀，也不像唐太宗那样重用，却采取给优厚待遇而罢官不用的新方式。这显然不能用人心的好坏来解释，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处境与汉、唐不同，汉、唐之前是秦、隋的统一王朝，宋之前则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局面。他如杀害功臣宿将，难以使资望较浅的将领同心同德，为他去削平各国，统一天下。如果重用宿将，又怕完成统一大业之时，取代赵氏政权，两种方式都不可取，于是就创造了第三种模式。

原载《山西大学学报》，1991年第1期。

注释：

- ① 《宋史》卷 250 《王彦升传》。
- ② 《宋史》卷 261 《张铎传》。
- ③ 《宋史》卷 484 《周三臣传》。
《旧五代史》卷 124 《王殷传》。
《旧五代史》卷 114 《世宗纪》。
- ④ 《宋史丛考》第 268 页《论宋太祖收兵权》。
- ⑤ 《旧五代史》卷 114 《世宗纪》。
- ⑥ 王溥：《五代会要》卷 12。
- ⑦ 《旧五代史》卷 119 《世宗纪》。
- ⑧ 《宋史》卷 1 《太祖纪》。
- ⑨ 《宋史》卷 261 《李琼传》、《李万全传》。
- ⑩ 《宋史》卷 261 《李琼传》。

⑬《宋史》卷 250《赵彦徽传》、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 9 开宝元年 5 月丙午。（下引此书简称《史编》）

⑭《宋史》卷 254《赵晁传》。

⑮《宋史》卷 256《赵普传》。

⑯《宋史》卷 263《吕余庆传》。

⑰《宋史》卷 263《刘熙古传》。

⑱《宋史》卷 264《沈伦传》。

⑲《宋史》卷 257《李处耘传》。

⑳《宋史》卷 484《周三臣传》。

㉑《长编》卷 1，建隆元年八月丙子。

㉒《宋史》卷 258《曹彬传》。

㉓《宋史》卷 250《王审琦传》。

㉔《宋史》卷 251《慕容延钊传》。

㉕《宋史》卷 251《韩令坤传》。

㉖《宋史》卷 261《祁廷训传》。

㉗《旧五代史》卷 103《隐帝纪》。

㉘《宋史》卷 255《张永德传》。

㉙《长编》卷 1。

㉚《长编》卷 2，建隆二年七月庚午。

㉛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卷 1。

揭开‘斧声烛影’之谜

千百年来，“斧声烛影”成为一大疑案。事过千年，当事人的声音已无法听到，史官的记载又多回护曲笔，我们现在能弄清事实真相吗？我认为，只要尽可能全面掌握材料，运用科学分析的方法，把有关“斧声烛影”的一切蛛丝马迹搜集起来，并作综合考察，真相是有可能澄清的。

一、有关驾崩的几条记载

文莹《续湘山野录》云：

祖宗潜耀日，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，无定姓名，自曰混沌，或又曰真无，……自御极不再见，……后十六载，乃开宝乙亥岁也。上已袞褕，驾幸西沼，生醉坐于岸木阴下，笑揖太祖曰：“别来喜安。”上大喜，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，恐其遁，急回蹕与见之，一如平时，抵掌浩饮。上谓生曰：“我久欲见汝，决克一事，无他，我寿还得几多在？”生曰：“但今年十月廿日夜，晴，则可延一纪，不尔，则当速措置。”上酷留之，俾泊后苑。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，止数日不见。帝切切记

其语。至所期之夕，上御太清阁四望气。是夕果晴，星斗明灿，上心方喜。俄而阴霾四起，天气陡变，雪雹骤降，移仗下阁。急传宫钥开端门，召开封王，即太宗也。延入大寝。酌酒对饮。宦官、宫妾悉屏之，但遥见烛影下，太宗时或避席，有不可胜之状。饮讫，禁漏三鼓，殿雪已数寸，帝引柱斧敲雪，顾太宗曰：“好做，好做！”遂解带就寝，鼻息如雷霆。是夕，太宗留宿禁内，将五鼓，周庐者寂无所闻，帝已崩矣。太宗受遗诏于枢前即位。逮晓登明堂，宣遗诏罢，声恸，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，玉色温莹如出汤沐。

按文莹，僧人，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作《湘山野录》其后作的《续录》称王安石为荆公，安石封荆国公在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九月，又称神宗为皇帝而不称其谥号，知其时神宗尚在世，则此书应作于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至七年（1084年）间，上距太祖之死100年有余。文莹“交游尽馆殿名士”，常出入于达官贵人之家，如丁谓（966~1037年）、苏舜钦（1008~1048年）、欧阳修（1007~1072年）、王安石（1028~1074年）、元绛（1008~1083年）、石扬休（995~1057年）等。这些人都是朝廷要员，了解内幕，有的人（如丁谓）太祖死时年已11岁，后来当了宰相，他们有可能接触当时甚至当事之人，文莹记载绝非向壁虚构，故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据此录入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7。这条材料说明：

1. 宋太祖死前身体无病，故能邀光义酌酒对饮。太祖之死，事出突然。

2. 太祖死前，只有光义在场。太祖在睡眠中死去，其时光义“留宿禁中”，只有他有作案的可能，有作案的时间和条件。也只有他作案能得到最大的好处，取而代之，即皇帝位。

3. 天明后请近臣看遗体，“玉色温莹如出汤沐”，是为了证